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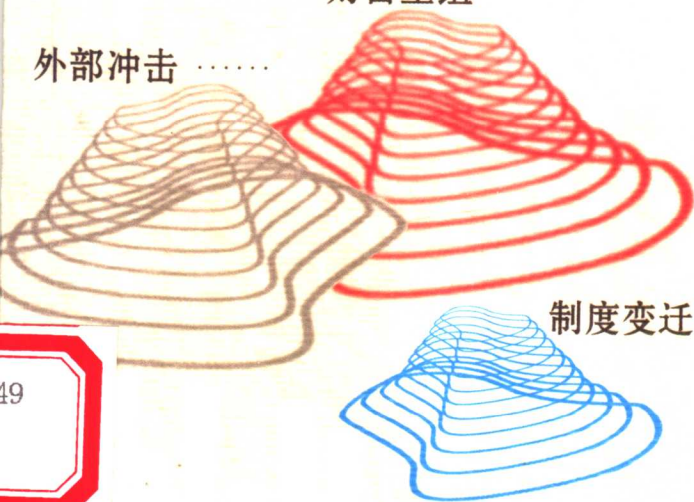
美洲金银和 西方世界的兴起

张宇燕 高程 著

财富重组

外部冲击

制度变迁



49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F091.349
Z238



郑州大学

04010243337R

44
日方世界的兴起
美洲金银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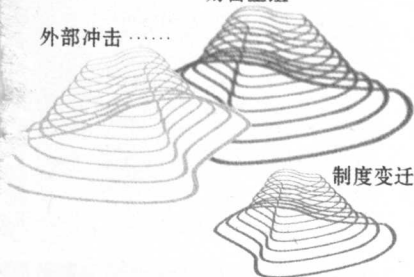
张宇燕
高程
◎著



财富重组……

外部冲击……

制度变迁……



QB01/03

F091.349

Z238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张宇燕, 高程著.—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86-0334-6

I. 美… II. ①张… ②高… III. ①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②经济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F091.349 ②F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3439 号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MEIZHOIJINYIN HE XIFANGSHIJI DE XINGQI

著 者: 张宇燕 高 程

责任编辑: 晋 晶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334-6/F·815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序

在撰写博士论文《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1991）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论证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强有力的因果联系，并且还得出了一个口号式的简化结论：“惟有制度是起作用的”。局部和静态地看，人的偏好与行为均严格地受制于将其包围于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制度。用诺斯的话讲，它们是指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用我自己的话讲叫做规则和习惯。尽管这个看法时至今日仍旧适用，但其适用范围或解释力却是有限的。其中要紧的问题是，制度是由人创造和遵从的，可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或那样的制度？在《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1993）中，我尝试着回答了人们选择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这一“悖论”。诺斯后来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强调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的重要性，过渡到探究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上来。不过他进一步把分析的重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倒让我觉得有些走过了头。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特别是制度变迁的方向与速度，我开始关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或利益集团

理论。奥尔森通过剖析各种社会内“分利集团”的私利与国家整体利益对立之性质，并凭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僵化”的范式，简洁且有力地解释了国家的兴衰。沿用这种分析思路，我先后完成了《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1994）、《放松管制的博弈》（1995）和《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与孙广振合著，1997）等论文，着重讨论了利益集团的性质与作用、其数量与规模的含义，以及它们与长期稳定和增长的关系。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分析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来对那些“歧视性的”制度的创立或变迁加以阐释。在利益集团层面上讨论制度变迁，尤其是再伴之以带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实例，比起单纯地讨论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显得要充实一些，现实感也要强一些。

在论及中国电信改革或制度变迁的起因时，我的一个命题——财政压力导致政府放松管制——引起了论争。为此，我又写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与何帆合著，1997），以求更加细致和完整地论证这一命题。在当代中国，感受到财政压力的主要是政府，而产生财政压力的根源则在于存在着众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性质》（与何帆合著，1996）一文以隐含于政策之中的充分就业和赶超增长目标为基点，一方面描述了国有企业的“边界刚性”和其改革自然会走一条“内部市场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还暗示出“甩包袱式改革”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加以推行。这里，由于涉及财政

问题，政府或国家被当做了分析的一个焦点。不过那时我对国家的分析主要是集中于经济层面，关注的问题是政府政策、管制与利益集团的互动，并没有把研究延伸到宪政层面。

国家兴衰取决于制度；制度的关键又在于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人权利逐步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同时又是宪政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这样一来，制度选择与国家兴衰问题也就转换成了对宪政改革的起因、过程和启示的分析与归纳。在博士论文和后来发表的《美国宪法的经济学含义》（1993）中，我曾经触及立宪问题，简单说就是使政府在宪法规定下行使被赋予的有限权力，亦即本分地和有效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不过那时讨论宪政的角度和侧重点与今天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特别地，十几年前我虽然多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缺乏必要的逻辑框架和经验环节。三年多前，我读了尼尔·弗格森的《金钱结构：当代世界的货币与权力 1700~2000》、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相关的另外几篇经济史论文（如理查德·格兰的“中国十七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美洲金银似乎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以致让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把外部冲击、制度变迁、宪政改革与长期增长串联起来的逻辑线索。其结果便是《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这篇长文。

坦率讲，这是一个难度颇大的论题。说它难，首先在于相关的论述卷帙浩繁，做到充分阅读几乎是不可能

的；其次，众多名家大师对它多有涉及，以至于为后来者留下的发挥空间极为狭小。但这个问题如此重大，以至于想起来便心旌激荡。与此同时，按照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名作《历史的观念》中的说法，历史学是通过证据的解释来进行的，其价值在于自我认识，亦即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或人类社会是什么。所谓“证据”是指那些叫做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是一种存在着的、历史学家思索后就可得到他对过去所做探究之答案的东西。然而证据不是一成不变的。某种证据之所以会变化，是由于历史学家们的能力、历史研究方法、解释证据的原则，以及目标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每代人都往往，而且也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基于此，我们写了此文。

这篇论文是一部合作产品。我的合作者高程对此文贡献甚大。许多数据、史料和部分初稿均出于其手。一些颇有见地的想法也由其提出。在近一年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之间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交流对各种文献的看法。文章也是一改再改。也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一次比较成功合作的经历，我们目前正在集中精力，共同对多年来一直令我魂牵梦绕的问题——明代中国“错失历史机遇”的内因外因——进行探讨。可以被视为此文姊妹篇的这项研究，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预计年内我们可以拿出初稿。

在此，我本人，并代表高程，对那些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提出了很有价值之意见与建议的人士表示深深的

谢意。他们是：吴思、陈平、孙广振、丁一凡、张军、郑秉文、李向阳、贺力平、孙杰、向松祚、时红秀、李增刚。本文的简写本就有四万多字，它能够在《社会科学战线》今年第一期上发表，还多亏了李华编辑的帮助。今天它又得以按单行本形式出版，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姜勇和晋晶女士。当然，感谢归感谢，文中的一切疏漏和错误还是全部要由作者负责的。

张宇燕

2004年9月3日于北京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摘 要

“西方世界的兴起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一结论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可这种有效的制度是如何在西欧形成的呢？本文试图从外生货币变量的角度，对制度学派所讲述的故事进行一些补充。我们注意到，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重新分配，从而最终导致了制度创新。正是因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持续增长两者相互促进，西方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通过把美洲贵金属流入和欧洲制度变迁相联系，并借助“制度—货币”二元分析，我们建立了一个“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针对传统的“长期货币中性”理论，我们证明了货币（铸币）量变化的速度和强度，通过制度的作用，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针对那种把制度变迁视为内生结果的解释，我们说明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偶然的、



外生的冲击，往往是导致制度突变的关键；针对作为制度经济学“硬核”的产权理论，我们提出了“非中性产权制度的分布高于产权保护本身”的命题；针对导致制度创新的直接推动力问题，我们解释了如果没有新兴阶级的产生，特别是如果他们沒有壮大到足以同原有统治集团分庭抗礼，制度变迁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路径众多的制度变迁之中，惟有那些能够在群体或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残酷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制度变异，才具有生命力。中西方之间“突然”出现的差距，抑或可以从中得到部分解释。

【关键词】 美洲金银 财富重组 阶级兴衰 制度变迁 金融创新
经济增长

目 录

序	(I)
摘 要	(VII)
第一章 引 言	(1)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命题的提出	(11)
第三章 美洲金银流入欧洲与社会 财富的重新分配	(35)
美洲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货币存量的增加	
“长期货币非中性”命题的提出	
欧洲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第四章 西欧阶级结构及国家 功能的变化	(61)
国家、阶级与产权保护	
商人阶级的兴起与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	
财富与强权的融合:对“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 重新回顾	
第五章 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 产权制度的创新	(93)
新兴阶级对王权的不满和资产阶级革命	
产权保护的的非中性与产权制度的创新	



第六章 西欧有效资本市场的形成	(111)
政府信誉的建立与国债制度的确立	
私人信誉的建立与西欧融资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	
低利率、大规模投资和工业革命	
第七章 简要概括和补充说明	(137)
后 记	(155)
附录一 与论文相关的几封友人间 通信	(159)
附录二 理解历史研究	(174)
参考文献	(187)

第一章 引言

历史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那些长久令人困惑和兴奋的历史谜题似乎永远不甘屈从于惟一的谜底。本文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曾被前人讲过无数遍，想必还要被后人讲更多遍，却依然保持“年轻”的话题：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缓慢爬坡后，是什么原因使西欧国家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据估算，从公元前 100 万年至公元 1500 年，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全球人均 GDP 仅艰难地增长了不到 50%，¹且各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16 世纪后，西欧的增长却“突然”加速。根据麦迪逊提供的数据，从 1500 年到 1820 年，以 1990 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西欧人均 GDP 从 670 美元增至 1 269 美元，增长了 89.4%；而西欧以外的世界则从 532 美元增至 594 美元，仅增加了 11.7%。²二者之间的差距竟有近 8 倍之多！

人均 GDP 增长差距参差不齐是否称得上问题或“谜”，还是有争议的。戈德斯通教授就曾明确指出，西欧国家当时经历的所谓“全盛时期”并不是什么“专利”。经济的显著增长为何出现在某些地区（如西欧）而不是其

他地区，从超长期的角度看，只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过程。世界历史的长河蜿蜒流淌，类似的不平衡增长也曾多次发生在其他不同的国度、文明或地域。这些地区和民族亦曾把握住了历史机遇，通过文化扩散和商业交换，凭借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拓展，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相对较快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城市和人口规模的扩张等方面。一个地区或文明达到“全盛时期”后，又总是趋向于一种均衡状态，或曰惰性状态。鉴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精英们力图维护对他们有利的现存社会模式，技术创新的步伐便开始放慢甚至停滞，人口的超负荷增长导致制度坍塌，社会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明均有过被卷入到周而复始或“周期性荆轲”之中的经历。³戈德斯通在历史的长期层面上同布罗代尔一样，是一位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历史的无为性。⁴依照这种思路，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上升到所谓“谜”的高度，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无病呻吟。然而，这种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循环论，⁵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因为四百年前发生在西欧的故事太惊心动魄和耐人寻味了。毕竟，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还成功地迫使世界其他地区受它的奴役，又令它们纷纷追随和效仿，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把学术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任务或责任高度简单化了。更何况研究历史的真实动因往往是为了回答人类所面临着现实问题呢！

本文讨论的属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超长期增长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长”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斯密型增长” (Smithian growth)。这种增长来自“斯密动力” (Smithian dynamics)，即受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的推动，⁶ 其后果通常是产出总量和人均产量的同时增长。第二种是“熊彼特型增长” (Schumpeterian growth)，亦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的同时增长。从增长的结果看，这种增长也被称为“库兹涅茨型增长” (Kuznetzian growth) 或“现代经济增长” (modern economic growth)。⁷ 第三种是“粗放式增长” (extensive growth)，也就是只注重产出总量的增加而不甚关心人均拥有量提高的增长，它还被称为“量的增长和质的停滞”。⁸ 这里，我们需要对“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做一个理论上的区分。“斯密型增长”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明确表明那些催生“熊彼特型增长”的技术变革的价值。⁹ 那种过多依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斯密型增长”，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突破，必然会面临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市场的容量。当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资源的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便可能会陷入所谓“马尔萨斯危机”而进入停滞。换言之，单纯依靠“斯密动力”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工业化。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斯密极限”。¹⁰ 鉴于此，雷格莱曾直言不讳地说，古典经济学家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在其中，成功的经济增长路径充其量不过是一条渐进线，让经济以“指数”形式

递增几乎是天方夜谭，而“指数”增长才是近代工业革命中经济增长所专有的标志。¹¹比较而言，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指熊彼特意义上的长期经济增长。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技术与制度创新之间彼此作用、相互强化，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在进一步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西欧特定的人口增长率、经济规模、市场运作状况、科学技术条件以及政治环境和制度氛围等诸因素，通常被国内外学者视做解答问题的关键。让我们特别感到兴奋的是，近十几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若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16世纪、17世纪，甚至18世纪，那么西欧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双方在总体上势均力敌。一些学者¹²用实证方法，将当时中国和西欧社会经济的诸项重要指标逐一拿到天平上较量一番。结果表明，中国当时的综合水平至少不低于西欧国家。举例说，若以100作为190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按照这个参照系，甚至到了1750年，中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为8，而西欧几个重要的国家分别为：英国10、法国9、德国8、意大利8、西班牙7。¹³它们彼此之间的差距甚微。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还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近的人口结构、类似的商业城市发展水平和规模、新的生产方式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理

念和制度的抑制。¹⁴换言之，它们当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既然双方所处的原始状态相似，那么“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故事的神话色彩就变得愈发浓重。从表面看，创造“神话”的似乎是18世纪出现在西欧的那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¹⁵虽说将工业革命比喻为人均GDP这列火车得以提速的发动机或高效燃料并不过分，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工业革命为何在那个历史时点上成为了西欧的“专利”？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切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各种理论进行简要的归纳，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我们猜测性的答案，即美洲金银突然大量地涌入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乃西方兴起之源，是本文第二章的内容。第三章至第六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用来支撑我们的基本论点。其中，第三章主要剖析美洲贵金属流入西欧后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尤其是商人阶级的兴起；第四章通过分析商人阶级与王权之间的互动，说明新兴商人阶级对产权保护的需求是国家权力迅速扩张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第五章关注的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国家性质和产权制度的决定性变化，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我们分析的样本；第六章将重点分析与有效的金融市场形成相关的制度创新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与西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七章将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全文进行理论概括，并给出一些补充性说明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